

香港應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

譚惠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譚惠珠

「一帶一路」是中央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的關鍵時期，針對建立合作共贏的區域乃至全球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而提出的長遠戰略構想，是關於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尋求發展突破的重大決策。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分子，有責任、有義務參與到這一偉大戰略中來，同時在參與的過程中，香港也可利用自身經驗和國家的政策優勢，尋求經濟轉型調整，再現東方之珠的輝煌。

(一)背景

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要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跟着10月3日，習主席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時又提出，願與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在國際場合公開提出共同建設「一帶一路」的重大戰略構想。

(二)戰略意義

(1)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決策，對開創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首先，「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會助力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經濟換檔新的經濟增長點。「一帶一路」戰略可以促進中國經濟區域結構挑戰，改變原先點狀、塊狀的對外開放模式為網絡聯通、協同驅動的全域對外開放新版圖，強化地區間互聯互通與產業轉移。

(2) 其次，「一帶一路」的戰略意義並不僅在於助力中國經濟發展轉型，還在於它是全球經濟、政治格局面臨深刻調整的關鍵階段，由中國提出的新型區域合作戰略構想。「一帶一路」高舉和平、發展、合

作、共贏旗幟，秉持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目的是與沿線各國加深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這就要求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與沿線國家的發展戰略相互對接。這是我國和乎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在新時期的升級體現，也是國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國際關係領域的嶄新舉措。

(3) 最後，「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可以造福沿線國家人民，令世界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紅利，促進人類文明進步事業。與西方國家的對外開放及建造經濟貿易共同體以區別對待不同國家的做法不一樣，「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原則之一是「互利共贏」。「一帶一路」建設在空間、地域和國別上具有多元、開放和包容的特性，需要區域內各國共同推進合作進程，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戰略的深遠影響也遠超國家開放、區域合作的範疇，而是對整個世界、全人類在資源緊張、競爭劇烈的背景下如何展開互利共贏的合作提供新的典範。

(三)香港有條件大有作為

據新聞報道，目前全國28個省份在各自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均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如何參與「一帶一

路」。面對如此巨大的戰略機遇，香港不應該也不能夠落後於其他兄弟省份。「一帶一路」沿線多為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程度差異大，市場潛力明顯，香港憑藉多年來積累的軟硬件優勢，包括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市場規則，豐富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物流中心的競爭經驗，優秀的管理經驗和豐富的管理人才、語言文化與內地相近相通等，有條件大有作為。具體而言，可以在以下方面尋求新的發展機遇。

(1) 充分利用軌道交通管理方面的經驗

(a) 「一帶一路」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突破口，鐵路是「一帶一路」的關鍵和互聯互通的主體。根據估計，未來「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包括中俄高鐵等的鐵路線路總長在1萬公里左右，涉及總投資3,000億—5,000億元。全球高鐵規劃超過4.3萬公里，在建高鐵超過2.8萬公里，僅東南亞市場軌交項目總投資規模就接近9,800億元。眾所周知，香港在軌道交通的佈局、管理等方面具有世界級的水準，擁有豐富的經驗和眾多的人才，與內地軌道機車在研發、製造、生產方面的世界領先優勢恰好可以形成優勢互補，攜手打進「一帶一路」沿線周邊國家，提供優秀的軌道交通建造與管理。

(b) 軌道交通建造與管理與房地產的經營管理相輔相成，高鐵沿線的地區，可有區別地發展住宅區、金融商業區、工業園區、旅遊業區域、醫療和養老院區，香港在這方面有資金和管理技術，可以採用承包的辦法，參與大規模開發。香港的股票市場，也可以為相關的項目安排發行債券和股票，吸納民間資金參與。中東油國擁有大量的資金，也可以引導資金到香

港來，按照伊斯蘭的習俗，發行股票。

(2) 充分利用香港作為航運樞紐的管理經驗，為打造海上絲綢之路服務

(a) 在香港建立輪船業的註冊中心，提供國際船級的高級管理服務，包括輪船的海上意外保險、檢驗、租賃、買賣和海上意外事件的仲裁處理。香港的大學應該設立輪船業的高級服務管理的學系。香港也應該大力發展輪船服務業和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家的旅遊業，把中國沿海的商業城市和東南亞的旅遊風景區連接起來。

(b) 香港還應該發展八所大學的優勢，在東南亞地區發展分校，為東南亞國家培養經濟貿易、工業管理、設計創新、旅遊發展、會計、法律的人才，為未來投資，加強這些人才和香港的貿易和服務業聯繫。

(c) 香港的銀行應該對海上絲綢之路提供投資顧問的服務，為各國的企業和資金找尋投資的合作夥伴，進行收購合併，協助內地企業對外投資，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減少風險，減少盲目性，減少損失，增加成功的機會。

(d) 東南亞國家的互聯互通，需要大量的海關、銀行、物流的統一標準的運作，需要大量電子軟件的配合，需要開發很多電子程式，需要大量這方面擁有同一思維邏輯的人才，香港可以提供這樣的電子軟件和人才。

(e) 文化事業的輸出，香港的電視節目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進行合作，交換節目，交換影片，甚至製作教育性電視節目，推動互聯互通，宣傳中華文化。

(二之一，明日待續。)

中小企對大學生的期望

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

大學生是社會未來的棟樑，無論是家長或社會，都希望大學可以培養出能為社會服務的人才。中小企養活著整個社會百分之七十的人，對大學有更高的期望，希望培養出來的人能切合實際，把中小企的基礎用好用，讓企業越做越大。中小企為年輕人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也給了年輕人施展抱負的平台。有能力的人才可以讓企業十倍、百倍的發展起來，讓香港飛黃騰達。中小企渴求人才，在大學生還在讀書時給他們提供實習的機會，也希望他們學成後給中小企帶來活力。中小企對大學生的期望真誠而熱切。

中小企絕不希望學校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是不切實際的人，不做實事，只想奪權。目無法紀，目中無人，只有空想，沒有實幹精神的人，無法對企業有貢獻。只有謙虛謹慎，以禮待人，行為舉止優雅的人代表的企業，才能受到廣泛的尊重。行為囂張，以恐嚇為能事的人，企業遲早完蛋。大學要教育好學生，給學生指引正確的道路。青年學子則應在求學階段，對學問執著地追求的同時，不斷完善個人的人格和素養，否則有才無德，也難以在社會上立足。

大學生必須有創新精神，能夠創造效益的人，才是企業最有價值的財富。那些動輒以暴力手段，強迫管理層做出符合他們心意的任命決定的青年人，香港中小企絕不希望請到這種伙記。港大作為香港的高等學府，培育的應是德才兼備的人才，不應是目無師長，知法犯法的暴徒。

希望大學生畢業後，懷揣一顆貢獻香港的心，憑藉個人聰明才智建設社會，也開拓屬於自己的人生坦途。只有在法治的保障下，人人都各司其職，眾志成城，香港才可長盛不衰，繁榮穩定。年輕人如果對祖國抱持偏見與誤解而武斷地把一個能養活13.4億人口的中央政府說到如此不堪，這些年輕人是否需要重新了解並認識自己的祖國，重建自己的身份認同？中小企絕不希望香港大學培養出只會指責，不會做實事的學生。大學生好好讀書，學好本領，也學會做人，社會的福祉就有保障，中小企的發展才有希望。

筆者記得兒時讀《孟子》，當中有一句「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道出人不忍他人受害的本性。即使不知是何人，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兩千多年前已有一顆良心。現下天津發生嚴重爆炸事故，死傷之慘烈令人心中的憐憫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但居然有聲音勸人勿捐款賑濟，甚至對這一巨大災禍拍手叫好，連禽獸也不如的態度，比魯迅筆下的「看客」更為差劣，讓人驚訝。

爆炸慘劇翌日，災區死傷慘重，面目全非。所謂人命關天，即使不能伸出援手，出於人性，感到痛心也是應有之情，然而網上部分冷血人士的留言，居然對事件叫好，甚至認為死得不夠，又以「支那人」等極具挑釁侮辱性的言語譏罵。當年二戰納粹德軍對猶太人橫加殺害，日本人於南京屠殺30萬中國軍民，此種種族屠殺，已可謂人神共憤，世人為之側目。今日天津同胞與港人同屬炎黃子孫，即使內地與香港近年時有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衝突，但動物尚且對同伴有愛護之心，這些人難道禽獸不如？

爆炸事件以後，關注事件真相，本屬無可厚非。不過救援工作有先後緩急，我們可以關注任何事情，就像有人關注消防員的安全，有人關注災區食品的安全，有人關注當地土地規劃，有人關注天津今後去向，其實也無不可。惟獨是這些關注，不能影響救災工作，不能抹黑或攻擊正在救援第一線工作的救災人士，更不能在受災民眾的傷口上撒鹽。有外媒不理災區居民感受，肆意採訪，到處滋事，不僅阻礙救災進度，更傷害了受災民的感情，實在有違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操守。

事實上，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十分關心天津的同胞手足，筆者衷心希望天津同胞們能勇敢面對災難，盡早走出傷痛，還請你們加油！



李世榮

人命關天 豈容冷血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沙田區議員 李世榮 新社聯副總幹事、

安倍講話為何未能深刻反省二戰歷史？

宋小莊 法學博士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二次大戰結束七十周年之際發表的講話，無法獲得中韓兩國官方及民間的諒解接受，一方面是由於安倍在演講中認罪態度不誠懇，沒有對侵略罪行進行真誠反省，更重要的是，他企圖將日本發動戰爭不歸咎於軍國主義，推諉開脫戰爭罪行，根本沒有對「以史為鑒」有深刻正確的理解與踐行。日本的軍國主義能否隨着安倍講話而解脫，日本的新憲法可否為戰爭解套，延續二戰政治格局和新世紀的經濟秩序會否成為日本挑戰的對象，世人正拭目以待。

安倍講話三宗罪 戰爭受害國不買賬

就篇幅上說，此次安倍的講話比50周年、60周年時的村山講話、小泉講話多了3至4倍，也同樣有「侵略」、「殖民主義」、「反省」、「衷心道歉」等字眼，講話中也提到中國人民撫養日本在華孤兒的感人事跡，也解釋了戰後出生的日本人民數目已經超過總人口的80%，「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但是，中韓兩國官方和民間都表示不滿，認為安倍不誠懇，沒有真誠反省。這是由於中韓兩國飽受日本侵略戰火的蹂躪，尤其於其他國家，所以不能放過安倍嗎？這是不無關係的，例如中韓慰安婦的問題、民間賠償問題，日本都不願意，也不打算處理。但安倍之所以如此講話，中韓之所以不滿意，不僅限於此，還有其他的原因，其中主要有：

一、講話本身設置因果關係。講話沒有將日本發動戰爭歸咎於軍國主義，而是諉過於別人，安倍說是由於歐美各國的殖民地經濟使日本的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日本才迷失了，變成國際秩序的挑戰者，他自己對本國國民傷亡哀痛之感，甚於戰禍影響其他國家的人民傷亡的哀痛。他也沒有像村山等日本領導人認錯的勇氣，村山當年說，「我國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我謹此再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但安倍所「反省」和「道歉」的只是「我國對那場大戰中的行為」，為何如此差答答、不明說檢討的是「殖民統治」和「侵略」的行為呢？是不是還有挑戰二

戰以後形成的政治格局、挑戰經濟全球化後的經濟新秩序的圖謀呢？

二、對「以史為鑒」有誤區。中華民族有尊重歷史的文化傳統，《詩經·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說是殷商要以夏桀為鑒戒。《易經·大畜·象傳》：「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強調對過去要有深刻認識，成為砥礪力量。《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不論年代久遠，對書經體現的過去的政治也要感悟。唐·吳兢《貞觀政要》載唐太宗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更是大家熟悉的名言佳句。由此可見，中國人反省歷史的目的，是為了知興替，明得失，不是為了得到道歉而說反省。中國的斷代史，都是後朝修前朝史，治史者早已與前朝無關，難道就總總修前朝的教訓嗎？中韓兩國沒有要求日本「永遠」道歉，為何安倍要為當下的日本人「被道歉」解脫呢？這顯然是安倍錯誤的歷史觀作祟。

三、試圖改變和平憲法。亞洲國家乃至世界都在不同程度上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和平憲法是關押軍國主義這隻「老虎」的籠子，這隻老虎出籠後會咬人嗎？連美國都不敢完全排除這個可能性，到底這是世界上受到原子彈攻擊的「老虎」，報復起來不得了。二戰之後日本之所以和平，是遵守和平憲法的緣故。由美國軍方主持的日本憲法第9條第1款指出，「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家權力發動的戰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第2款還規定，「為達成

前1款目的，不保持海陸空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該條就是日本和平憲法最重要的條文。根據日本憲法第96條的規定，修憲是要經各議院全體議員三分之二議員贊成的。但為了修改和平憲法，安倍打算先修改第96條，降低修改憲法的門檻。日本如不修憲，就有悔罪之意。倘若修憲，再道歉一百次也沒有人相信，何況是那種假「道歉」。一方面道歉，一方面擴軍。憲尚未修，今年的軍費已增至歷史新高，這是什麼表示？

戰後對戰犯的審判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參考性思路。在二戰之前，國際法上沒有審判戰犯的制度。二戰期間，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空前暴行，激起全人類的義憤，促進有關戰爭罪的國際戰責責任制度的形成。蘇、美、英、法執行了《關於德國暴行的宣言》（莫斯科宣言）和《關於告發及懲處各軸心國家主要戰犯》的協定，設立國際軍事法庭，制定該法庭憲章。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紐倫堡軍事法庭審判了法西斯戰犯，判決12人絞刑，7人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宣佈納粹黨領導機構、秘密警察和黨衛軍為犯罪組織。差不多同時，中、蘇、美、英、法、荷、印、加、澳、紐、菲十一國的代表也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46年4月到1948年1月在東京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判決7人絞刑，16人無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

然而，對國際戰爭責任制度，審判法西斯德國戰犯和審判日本戰犯卻有不同。前者懲處較為徹底，後者懲處並不徹底，例如日本關東軍司令、日本華北侵略軍司令和731細菌部隊等重要戰犯都沒有成為東京審判的對象。1950年3月，遠東盟軍司令部還宣佈「宣誓釋放制度」，據判決書在日本執行刑期的所有戰犯，可以在刑期終了前釋放。紐倫堡審判的徹底性，是德國很快成為「正常」國家的原因，但東京審判的不徹底性，加上其他因素，卻使日本又走上另類道路的可能性。日本的軍國主義能否隨着安倍講話而解脫，日本的新憲法可否為戰爭解套，延續二戰政治格局和新世紀的經濟秩序會否成為日本挑戰的對象？世人正拭目以待。

不容「雙學四丑」逃避法律制裁

青鋒

近日，警方根據去年「佔中」時的「9·28」衝擊政府總部東翼的暴力事件，通知將於8月28日起訴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現學聯秘書長羅冠聰、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及成員林淳軒四人，控以涉「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參與非法集會」及「普通襲擊」罪。這「雙學四丑」聞之即聲稱是「政治檢控」，扮作「受害者」妄圖開脫罪責，倒打一耙，博取同情。

此間輿論和政界中人，紛紛斥責四學丑的一派胡言，堅決支持將他們繩之以法，不可姑息輕判！首先，所謂「政治檢控」是自掌嘴巴。「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早就知「佔中」違法，故用「公民抗命」包裝，聲稱「公民抗命」的定義是「自我犧牲承擔罪責」，「願意接受法律制裁」就是體現「公民抗命」精神。戴耀廷早就將「公民抗命」行為與違法完全畫上等號，故他預備並號召參與者去灣仔警署自首。作為戴耀廷的馬前卒、願作「佔中」先鋒和指揮的周永康，在失敗

後的去年12月24日在電台稱：「如果被檢控或入獄，這是我可以承受及願意付出的代價和犧牲」；而羅冠聰也在「佔中」前的7月14日撰文指：「公民抗命」參與者「是直接違法及承擔當中帶來後果」。如今檢控成真，卻否定去年承諾，害怕承擔罪責，這不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嗎？偽善、懦怯一至於此，實在可恥可笑！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聞「雙學四丑」的「政治檢控」謬論後回應指：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和他本人作出檢控時，不會加入任何政治元素。他重申：整個刑事檢控制度，動輒就說有「政治檢控」，是很不健康和不容觀的看法。這與香港「大律師公會」的觀點完全一致。去年10月9日，有鑑於非法「佔中」拖延逾月，「雙學四丑」又變本加厲地率眾衝擊政府總部，危害社會日烈；而暴徒們又秉承戴耀廷「公民抗命」歪理振振有詞抗拒法庭頒佈的禁制令，大律師公會便第二次發表聲明，引用加拿大艾屬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McEachern首席法官在Rv

Bridges案（一）的判詞指：「公民抗命」是一個哲學原則，而非法律原則。簡單來說，參與者故意犯法，目的在於引起別人關注……在參與者遭刑事檢控時，「公民抗命」不能成為對有關控罪答辯理由。一旦參與者因在公民抗命的過程中的行為涉嫌觸犯刑例而被起訴，若有足夠證據證明控罪，則無論行為的動機如何崇高可敬，在法律上亦不構成任何答辯理由，法庭也不會審訊時對受害者的政治理想作出評價或裁決。

大律師公會的名言是要告訴「雙學四丑」及反對派政客：其一，你要假「民主」政治早在「佔中」和「拉布」中顯示並不崇高，打扮、扭曲成「崇高」叫什麼「政治檢控」已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和審判。其二，法官也好，大律師也好，莫因違法者所謂「崇高理想」就輕輕放過，莫讓「雙學四丑」成法律逃兵，請為維護法律的神聖和尊嚴共同努力！